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城市群治理评价体系构建及应用 ——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

侯松¹ 甄延临² 曹秀婷¹ 张武晴² 吴桐³¹

(1. 嘉兴市国土空间规划研究有限公司, 中国浙江 嘉兴 314050;

2. 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空间规划院, 中国浙江 嘉兴 314050;

3. 浙江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中国浙江 杭州 310058)

【摘要】: 城市群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首要前提是推进城市群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基于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背景, 遵循高质量发展的价值判断, 构建城市群治理评价体系, 将城市治理效能量化并开展评价, 提出提高治理效能、加快推进城市群一体化建设的建议。研究认为: (1) 长三角城市群治理能力内部空间分异特征明显, 呈现东南高西北低的空间格局; (2) 分项看, 长三角城市群治理能力在经济、文化和社会领域变异系数最大, 以杭州湾大湾区和沪宁合发展带为代表的区域治理评价最好; (3) 生态治理与长三角自然地理特征具有较高一致性, 浙江西南区域和安徽南部区域呈现出高值特征。文章认为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的城市群治理要加强区域协同强化经济协作、加强跨区域基础设施建设与互联互通、加强内部文化价值挖掘与联动开发、强化区域生态安全格局共建、加强数据共享与跨区域体制机制创新。

【关键词】: 城市治理体系 组合赋权法 城市群治理效能 长三角城市群 城市群一体化 高质量发展

【中图分类号】: F29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8462 (2022) 02-0035-10

当前我国已进入以城市群为主导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1], 城市群成长发展的内外环境、要素禀赋条件发生深刻变化, 过去以要素投入、成本优势、人口红利、投资拉动、规模扩张为特征的增长模式受到越来越多的制约^[2], 相较于以高速增长为特征的发展方式, 高质量发展阶段城市群发展具有深层次的内涵特征^[3, 4, 5, 6]: 一是发展目标特征。不再追求经济增长单一指标, 而是转变为以人为核心的新发展模式, 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 实现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现代化四化同步。二是价值判断特征。不同于过去以发展规模、速度为导向的价值判断逻辑, 高质量发展阶段城市群发展的价值取向从整体出发, 追求经济、社会、生态等多方面的协同共生。三是要素结构特征。更加依靠人才、技术、知识、信息等高级要素, 突出创新引领经济突破资源能源、环境等瓶颈制约, 推动发展动能转变。城市群的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是以有效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提高城市群治理能力为前提。

城市群高质量发展, 首要前提是推进城市群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目前关于城市群发展和城市治理的研究, 特别

作者简介: 侯松 (1979—), 男, 浙江嘉兴人, 高级工程师, 研究方向为城市规划学、国土空间规划。E-mail: 42616615@qq.com; 甄延临 (1980—), 男, 陕西延安人, 博士,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研究方向为城市地理学、区域经济学、城市规划学。E-mail: 2937987@qq.com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21ZDA064)

是量化研究评价较少。梳理已有文献，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研究对象具有明显的行政层级特征，研究视角包括国家维度^[7]、省域维度^[8]、城市维度^[9]、区县维度^[10]和乡村维度^[11]，在城市群这一非行政层级上的治理体系研究较为鲜见，亦没有形成广被认可的研究成果，因此，这也是本研究的出发点和目标导向。从研究领域看，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研究涵盖经济领域的市场治理、政治领域的政府治理、文化领域的思想道德治理、社会领域的社会治理和基层治理、生态文明领域的生态治理、国防领域的军队治理、党的建设领域的执政党治理等多个领域^[12,13,14]。本质上讲，推进城市群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质上就是“形成一套与之发展阶段相适应的体制机制和法律法规安排”^[15]，包括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行政管理体系、绩效评价体系、政绩考核体系等一整套制度设计安排。本文以长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客体，以治理指标体系构建和评价为重点，从城市治理水平提高、治理能力协同共振的角度为我国城市群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贡献决策支撑。

1 指标体系、数据来源与评价方法

1.1 指标体系

1.1.1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城市群治理体系的内涵特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对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的总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16]，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使城市更健康、更安全、更宜居，成为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空间”^[17,18]，本文认为城市群高质量发展应该具有全局的引领性，在治理体系上体现在：

①必须支撑现代化经济体系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不断提升城市群内城市的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相较于全球一流城市群，我国城市群发展依然“欠优、欠佳、欠质”，需要实现质量、动力和效率的深刻变革，即产业转型升级、创新能力提升和运行效率提升，深化区域内大中小城市间产业链分工，继续提升对外开放水平，推动国内国外产业链的融合与互动，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19,20,21,22]。

②必须更好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适应城市人口流动、发展和需求变化。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向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城市群的发展必须要着力弥合区域、区际和内部的发展落差问题，突出更加“公共性、公平性、公益性”的城市资源配置导向^[8]，缩小区域差距、城市差距，补足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更好地服务人口的流动，服务好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服务人口的老龄化^[23,24]。

③着力构建零碳、韧性、安全的总体生态安全格局，提升区域环境品质打造生态宜居家园。国家“双碳”战略的要求推动城市群能源体系“非碳化”、产业体系“去碳化”、空间体系“绿色化”^[11,12]，同时围绕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生活的需求，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体现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思维，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把守住区域自然生态安全边界，提升生态系统的质量与稳定性，提供多元乐享的优质生态空间^[25,26,27]。

④关注文化价值的挖掘，激发文化、旅游等跨域消费，塑造区域城市品牌和品格。当前城市群内部城市“千篇一律”，核心问题在于内部文化价值的不足^[28]，推动城市群高质量发展，除了关注经济、协同、生态等问题，也应该着重关注文化价值的挖掘，通过文化挖掘赋能城市品牌，塑造城市品格，彰显城市独特文化魅力，并激发文化消费潜力^[29]。

⑤着力构建“智慧化”“数字化”的管理模式，推动区域资源共享，促进区域资源高效流动和行政高效管理。当前以智能化公共基础设施为代表的新型基础设施正成为城市转型的重要窗口，未来城市群的发展必须突出政府与企业、人民之间的高效交互模式^[24]，通过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应用带动区域社会生产方式变革、生产关系再造和生产空间重构^[30,31,32]。

1.1.2 城市群治理的评价指标构建

基于对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城市群治理体系的内涵特征认识,突出治理体系的全局引领性,构建“认识层—落实层—应用层”自上而下的传导逻辑,形成城市群治理效能的评价指标体系。

1.2 数据来源

本文以长三角城市群为评价对象(41城),评价数据包括统计数据、地理数据、开源数据。①统计数据来源:城市GDP、城市第三产业产值、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利用外资额等数据来自长三角三省一市2020年统计年鉴。城市R&D支出、年游客接待次数、专利申请量、城市常住人口等指标数据来源于EPS中国城市数据库、中国城乡建设数据库和中国人口普查与抽样调查数据库等。城市智慧化水平数据来自国家发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定期发布的《中国城市治理智慧化水平评估报告》(2017)。②地理数据来源:2020年中国土地利用遥感监测数据、水文调节价值当量、土壤保持价值当量、2020NASA开源人口格网数据、全国路网数据等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与数据中心、NASA社会经济数据和应用中心、全国地理信息资源目录服务系统等。③开源数据来源:城市公园拥有量、职工收入与城市房价比、上市公司总市值占GDP比重等指标数据通过Python爬取高德地图、天眼查网站、问财网站、安居客网站等获取。

1.3 数据处理及测算

目前主流的评价方法包括层次分析法、模糊综合评价法、灰色关联度法、主成分分析法、熵值权重法等等,不同的评价方法各有优点及其局限性^[33,34]。本文构建的评价模型属于多层次多指标的评价体系,在综合考虑各类评价方法的基础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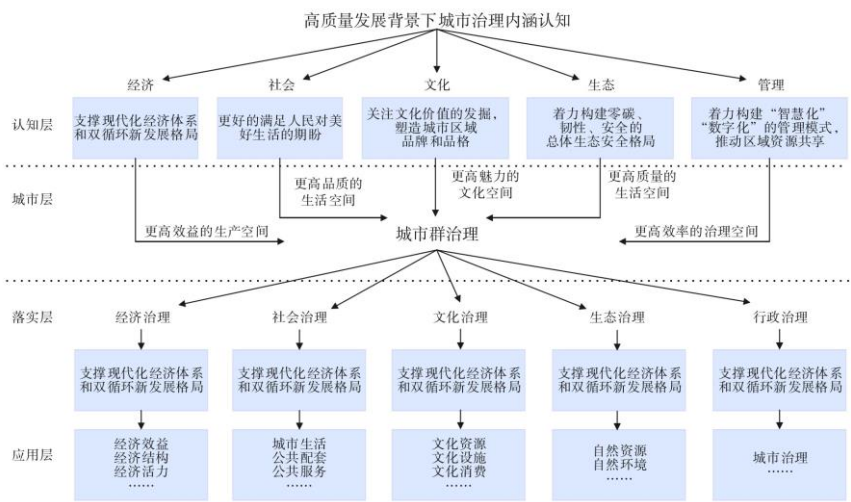


图1 城市群治理评价指标体系构建逻辑

采取层次分析法和熵权法组合评价法^[35,36,37]。模型计算主要分为三个步骤。

1.3.1 数据标准化

对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的标准化处理,为了最大化体现原始数据所包含的信息,保持与原始数据同分布,对原始数据的标准化采用极差法:

对正向指标标准化处理方法为:

$$Y_{ij} = \frac{x_{ij} - \min x_j}{\max x_j - \min x_j} \quad (1)$$

$$i = 1, 2, \dots, m; j = 1, 2, \dots, n$$

对负向指标标准化处理方法为：

$$Y_{ij} = \frac{\max x_j - x_{ij}}{\max x_j - \min x_j} \quad (2)$$

$$i = 1, 2, \dots, m; j = 1, 2, \dots, n$$

式中： x_{ij} 为第 i 个城市的第 j 项指标； Y_{ij} 为该指标的标准化； m 为城市数； n 为指标数。

1.3.2 计算综合赋权权重

第一步，基于 AHP 方法构建多层判断矩阵，并对构造的判断矩阵计算一致性指标（CI）：

$$CI = \frac{\lambda_{\max} - d}{d - 1} \quad (3)$$

式中： $\lambda_{\max}$ 是对应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根； d 代表对应判断矩阵的阶数。CI 值用于检查决策者判断思维一致性，CI 值越大，表明判断矩阵偏离完全一致性的程度越大；CI 值越小（接近于 0），表明判断矩阵的一致性越好。在满足一致性检验的前提下，计算 W'_j 。

第二步，基于熵值赋权法，计算第 j 项指标第 i 个指标值的比重 f_{ij} ，计算公式为：

$$f_{ij} = \frac{Y_{ij}}{\sum_{i=1}^m Y_{ij}} \quad (4)$$

计算第 j 项指标对应的熵值 e_j ，计算公式为：

$$e_j = -k \sum_{i=1}^m (f_{ij} \times \ln f_{ij}), k > 0 \quad (5)$$

式中： $k = \frac{1}{\ln m}$, $e_j \in [0, 1]$ 。特别地，当 $f_{ij}=0$ 时，为避免 $\ln f_{ij}$ 无意义，规定 $f_{ij} \times \ln f_{ij}=0$ 。

计算第 j 项指标的差异性系数 g_j ，计算公式为：

$$g_j = 1 - e_j \quad (6)$$

根据 g_j 计算 j 的信息权重得出权重矩阵 W_j'' 。

$$W_j'' = \frac{g_j}{\sum_{j=1}^n g_j} \quad (7)$$

第三步，计算综合权重。对于层次分析法得到权重 W_j' 和熵值法得到的权重 W_j'' ，基于相对信息熵最小化求解：

$$\min F = \sum_{j=1}^n \bar{W}_j (\ln \bar{W}_j - \ln W_j') + \sum_{j=1}^n \bar{W}_j (\ln \bar{W}_j - \ln W_j'') \quad (8)$$

$$s.t. \sum_{j=1}^n \bar{W}_j = 1, \bar{W}_j \geq 0 \quad (9)$$

根据拉格朗日乘数法，求解最优综合赋权权重为：

$$\bar{W}_j = \sqrt{W_j' W_j''} / \sum_{j=1}^n \sqrt{W_j' W_j''} \quad (10)$$

最后由综合赋权权重通过叠加计算、归一化处理分别计算二级维度权重 $W_j(s)$ 和一级维度权重 $W_j(t)$ 。

1.3.3 变异系数

变异系数源自于统计学概念，主要用来衡量资料中各观测值变异程度的一种统计量。本研究主要用来测定不同评价维度各个城市的差异程度 $C.V$ ：

$$C.V = (SD \div MN) \times 100\% \quad (11)$$

式中：SD 表示标准差；MN 表示平均值。

2 长三角城市群治理评价

在 ArcGIS 中采用自然断点法将 41 个样本的各维度评价结果划分四个等级，分别为较低、中低、中等和较高。

2.1 城市群治理综合评价

长三角城市群综合治理水平呈现东南高西北低的空间格局（图 2）。治理水平较高的城市包括上海、杭州、苏州和南京，均为长三角核心节点城市。具体来看，上海综合治理得分最高，在经济、社会、文化和管理四个维度都有较好表现，但是在城市生态维度的治理表现较差；杭州在城市经济、社会和管理三个维度的治理表现较好，在文化和生态维度表现中等；苏州在经济维度治理表现较好，在社会、文化和生态三个维度治理表现中等，生态维度治理表现相对不足；南京在经济和社会维度治理表现较好，在城市文化和管理两个维度治理表现中等，在生态维度治理表现相对不足。中等评价城市，包括无锡、常州、合肥、黄山、芜湖、嘉兴、湖州、衢州、丽水、温州、金华、台州、绍兴、宁波和舟山，共计 15 个城市，特别指出的是浙江除杭州属于较高等级外，其他城市都属于中等评价城市，显示出浙江省整体治理水平较高，各城市间落差较小。中低评价城市，包括徐州、连云

港、宿迁、淮安、盐城、泰州、扬州、镇江、南通、滁州、马鞍山、宣城、池州、铜陵、安庆、六安和蚌埠，共计 17 个城市，主要集中在苏北地区和安徽的环省会城市圈，分解来看，苏北地区中低评价城市较多的问题主要体现在经济、生态和文化维度的治理评价较低，而安徽环省会城市圈中低评价城市较多主要是城市经济、社会和文化维度的治理评价较低。较低评价城市，包括阜阳、淮南、亳州、淮北和宿州，共计 5 个城市，全部集中在皖北地区，五个维度的评价结果都表现出较低的水平。

2.2 城市群治理单项评价

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和管理维度的分项评价变异系数分别 0.5986、0.4072、0.9905、0.5615、0.3624，其中文化维度变异程度最大，管理维度变异程度最小。

2.2.1 经济治理维度专项评价

上海、苏州、杭州、南京和无锡 5 个城市表现最好。其中上海评价最高，其在经济效益、经济结构和经济活力三个方面都具有远超其他城市的表现。常州、嘉兴、宁波、芜湖、绍兴、合肥和湖州 7 个中等评价城市，在经济效益、经济结构和经济活力三个方面的表现差异较小，但是合肥、芜湖在经济效益方面要远低于同等评价水平的城市。总体上看，经济维度的中、高评价城市均集中在杭州湾大湾区和沪宁合发展带上，体现了杭州湾大湾区和沪宁合发展带对长三角地区的巨大经济贡献。中低评价城市，包括镇江、金华、台州、南通等 16 个城市，主要集中在浙南地区和苏中地区，呈现出依附核心城市的分布特征。较低评价城市包括盐城、宣城、淮安、滁州、蚌埠等 13 个城市，主要分布于安徽省，显示出安徽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与浙江、江苏仍存在差距。在省级尺度经济维度中，浙江省变异系数最小（0.3441），江苏省次之（0.4809），安徽省变异系数较大（0.5873），表明浙江和江苏内部不同城市经济发展异质性相对较小，而安徽省内经济发展落差相对较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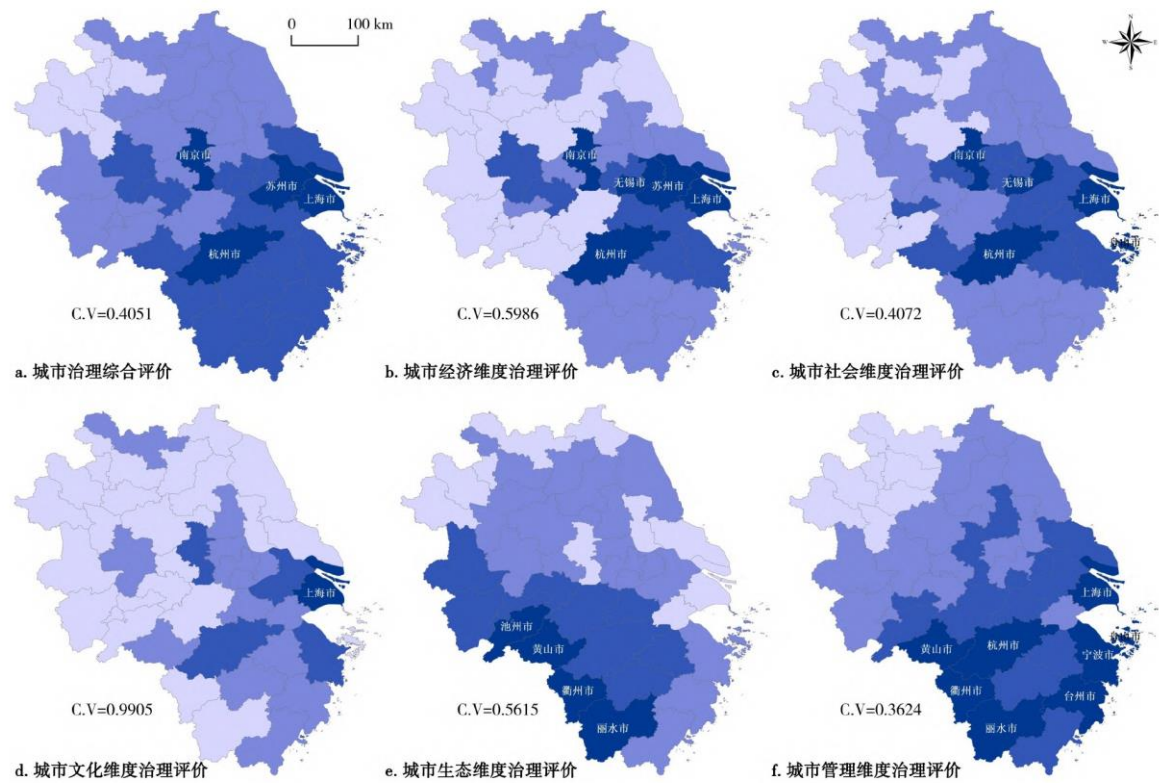


图2 长三角城市群 41 城城市治理综合评价及分项评价

2.2.2 社会治理维度专项评价

舟山、上海、南京、无锡和杭州 5 个城市表现最好，舟山在城市生活、公共配套和公共服务都表现出了较高的治理水平，上海、南京、无锡、杭州与舟山相比，在城市生活、公共服务上治理评价相当，但是公共配套上，尤其是体现以人均为导向的老年化公共设施以及健康体育公共设施，4 个城市与舟山差距明显。中等评价城市，包括苏州、铜陵、常州、马鞍山、黄山、湖州、宁波、嘉兴、镇江和绍兴，共 10 个城市，主要分布在浙北地区和苏南地区，在城市生活上铜陵和黄山两个城市与其他城市差距明显，在公共服务上马鞍山评价相对较低，在公共配套上总体评价都较低。合肥、淮南、芜湖、蚌埠、温州等 18 个城市属于中低评价城市，主要分布在浙南地区、苏北地区和皖中地区，在公共配套上落差较大、评价较低。较低评价城市包括宿迁、池州、六安、滁州、安庆等 8 个城市，主要分布在皖西和皖北，重点体现在公共服务和公共配套发展上的明显不足。分省域看，在城市生活上各城市发展落差总体较小，在公共服务上浙江和江苏评价表现较好，而皖北地区城市如阜阳、宿州等在公共服务评价上与省内其他城市相差较大，在公共配套上浙江、江苏、安徽各省省内都存在较大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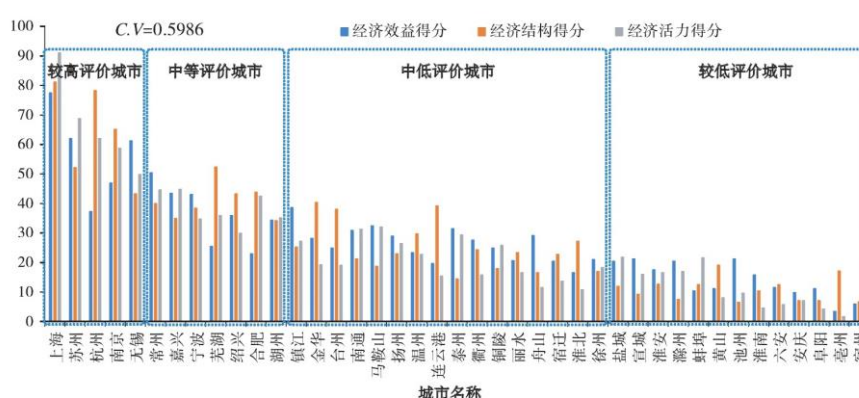


图 3 经济维度的治理评价

2.2.3 文化治理维度专项评价

文化维度的评价结果差异性较大，变异系数达到 0.9905。治理评价较高的城市只有上海，在文化资源、文化设施和文化消费三个方面都远超其他城市的治理水平，侧面反映了上海丰富的文化资源、完善的文化设施和具有活力的文化消费。中等评价城市包括南京、杭州、苏州和宁波 4 个城市，均属于江浙核心城市，南京、宁波在文化资源和文化消费上评价相对较好，但是文化设施评价上相对较低，杭州、苏州三项治理评价相对平均，但是杭州在文化消费上要弱于苏州。中低评价城市包括温州、合肥、金华、绍兴、无锡等 13 个城市，与中等评价城市差距体现在城市文化设施配套水平较低，在文化资源上各城市差异较大，而在文化消费上金华、黄山等旅游大市甚至能达到南京、宁波、杭州、苏州等城市水平。较低评价城市包括南通、盐城、丽水、芜湖、淮安等 23 个城市，在文化资源、文化设施和文化消费上都表现不佳。分省域看，浙江省文化资源治理水平较高，注重文化资源的挖掘和保护；江苏省则对文化资源的商业化开发做得更好；安徽相较于江苏、浙江两省差距明显，在文化维度的变异系数高达 0.9500，说明安徽文化资源的保护、开发与利用水平有待提升。

2.2.4 生态治理维度专项评价

结果显示丽水、黄山、池州和衢州 4 个城市表现最好，体现了自然资源 and 环境的禀赋以及生态保护上水平较高。中等评价城市包括宣城、安庆、杭州、金华、芜湖、铜陵、绍兴和湖州 8 个城市，较高评价城市与中等评价城市呈现出在长三角西南区域高度集聚的现状格局。中低评价城市包括滁州、苏州、宁波、台州、马鞍山等 18 个城市，在自然环境的治理水平上与中等评价城

The chart displays the scores for three categories across 30 cities, categorized into four groups: High (较高评价城市), Medium (中等评价城市), Low-Medium (中低评价城市), and Low (较低评价城市). The Y-axis represents the score, ranging from 0 to 100. The X-axis lists the cities. The legend indicates: 城市生活得分 (Urban Life Score), 公共配套得分 (Public Facilities Score), and 公共服务得分 (Public Services Score). The C.V. value is 0.4072.

城市名称	城市生活得分	公共配套得分	公共服务得分
舟山	68	80	65
上海	70	28	80
南京	48	30	75
无锡	65	18	65
杭州	60	12	65
苏州	28	40	42
铜陵	55	18	45
常州	55	22	45
马鞍山	35	28	32
湖州	62	10	48
宁波	58	8	50
嘉兴	65	10	50
镇江	55	12	45
绍兴	45	15	45
合肥	42	15	45
芜湖	38	28	35
淮南	50	15	35
蚌埠	38	22	42
蚌埠	42	10	42
温州	42	10	42
扬州	42	10	42
金华	42	10	42
泰州	42	10	42
衢州	42	10	42
南通	42	10	42
丽水	42	10	42
淮北	42	10	42
台州	42	10	42
盐城	42	10	42
淮安	42	10	42
连云港	42	10	42
徐州	42	10	42
宣城	42	10	42
宿迁	42	10	42
池州	42	10	42
六安	42	10	42
滁州	42	10	42
安庆	42	10	42
亳州	42	10	42
阜阳	42	10	42

C.V.=0.9905

■ 文化资源得分 ■ 文化设施得分 ■ 文化消费得分

较高评价城市 中等评价城市 中低评价城市 较低评价城市

城市名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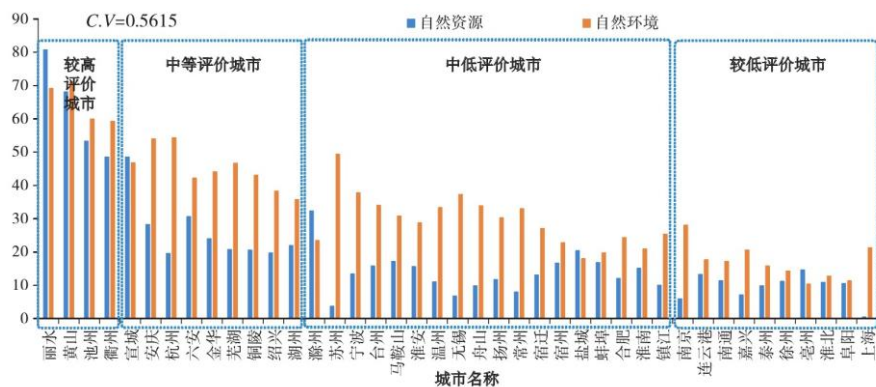


图 6 生态维度的治理评价

3 提高治理效能加快推进城市群一体化建设的建议

3.1 加强皖北地区中心城市建设，强化分工协同，缩小发展落差

深入推进皖北地区中心城市建设，打造辐射皖北的高增长极，加强经济合作和产业协同，高效打造重点产业平台，加快提升合肥经济首位度。引导经济发达城市与经济治理效能较低城市开展结对援助，通过飞地经济、总部经济、租赁经济、托管经济、共享经济、平台经济等多种合作模式，推动产业链跨区域协同，加强分工合作和政策创新，加强人才、产业、科技、金融等政策的融合对接，带动落后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实现城市群整体经济治理水平的提升。

3.2 推进跨省交界城市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提升城市群公共配套综合协同水平

加快提升城市群高品质公共服务供给，聚焦浙沪、浙皖、沪苏、苏皖等跨省交界城市，引导共同加大对跨区域基础设施投资，共同加大对优质公共服务的跨区域输送，加快补齐跨区域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促进优质公共资源合理布局，引导人才、产业、科技等要素合理流动。促进养老与医疗、文旅等融合发展，带动区域养老产业发展。

3.3 合力共建城市群文化大走廊和文化带，促进城市群文化繁荣与消费活跃

增强对城市群文化价值挖掘与开发的组织规划和宏观指导，共建长三角地区跨省跨市文化大走廊和文化带，促进文化交流，增强文化传播，共建世界级旅游目的地。推动文化与旅游等融合发展，实现城市文化资源和载体、内容和形式、休闲与体验的深度融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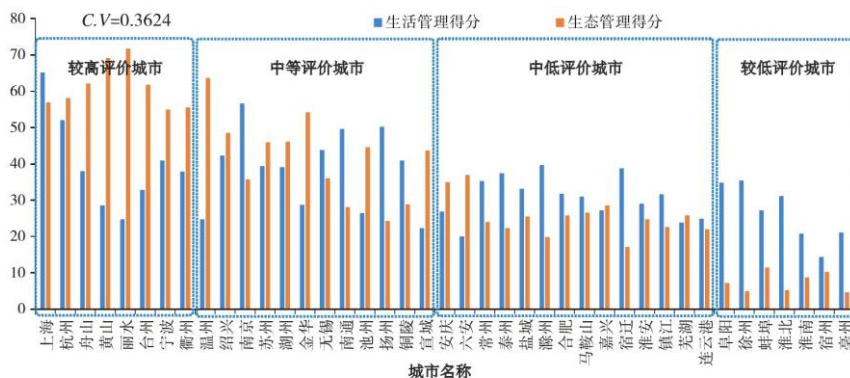


图 7 行政管理维度的治理评价

3.4 强化区域安全生态格局共建，推动低碳生态宜居生活空间建设

加强跨界区域生态环境共建，严格落实城市生态功能区划定。加强对生态环境保护，支持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在区域环境保护上的创新应用，共同支持风能、氢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清洁能源的推广和使用，建立节能减排的长效机制，加大对皖北地区和苏北地区的城市环境治理力度，加强对污染物的排放控制。

3.5 加强数据共享与跨区域体制机制创新，促进城市群内部资源更高效流动

推进以城市群为主体的智慧化治理体系建设，推进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手段在城市治理领域的创新应用，打破当前城市群内部数据孤岛，推动数字化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实现对人才、企业、技术、安全、产业等高效管理。

4 结论与讨论

综合评价看，长三角城市群综合治理水平呈现东南高西北低的空间格局，上海、杭州、苏州和南京治理水平较高。浙江省各城市间治理效能落差较小，整体治理水平高于江苏、安徽两省。安徽省各市受限于城市经济、社会和文化维度的治理评价整体偏低。经济治理维度上，经济维度的中、高评价城市均集中在杭州湾大湾区和沪宁合发展带上，体现了杭州湾大湾区和沪宁合发展带对长三角地区的巨大经济贡献。经济治理效能评价较低城市主要分布安徽省，且省内经济发展落差相对较大。社会治理维度上，舟山在城市生活、公共配套和公共服务都表现出了较高的治理水平，特别是以人均为导向的老年化公共设施以及健康体育公共设施服务水平优于上海、无锡、南京、杭州这些核心城市。整体上浙北地区和苏南地区城市社会治理效能高于其他城市。文化治理维度上，评价结果差异性较大。浙江省文化资源治理水平较高，注重文化资源的挖掘和保护，江苏省则对文化资源的商业化开发做得更好，安徽相较于江浙两省差距明显。生态治理维度上，长三角自然地理特征具有较高一致性。浙西丽水、衢州，安徽西部黄山、池州 4 个城市表现最好，体现了自然资源和环境的禀赋以及生态保护上水平较高。南京、上海两个长三角的核心城市在生态维度上属于较低评价城市。分省域看，浙江、安徽总体表现优于江苏。行政管理上评价差异性较小，浙江综合表现最好，江苏在城市管理方面的治理水平表现远高于浙江、安徽，但在生态管理方面的治理水平较浙江要低，安徽生态管理呈现南强北弱格局。

本文构建了包含经济、社会、文化、生态、行政管理五个维度的城市群治理效能评价体系，将城市治理进行量化评价。但目前研究重点是以城市为个体的评价，后续将拓展以城市群、都市圈为客体的治理效能评价研究，着力提高城市群治理效能，加快推进一体化发展。

参考文献：

- [1]宋洋，龙粤泉.新发展格局下的经济高质量发展[J].中国发展观察，2020(23):26-28.
- [2]孙久文，张翱.“十四五”时期的国际国内环境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J].中州学刊，2021(5):20-27.
- [3]张军扩，侯永志，等.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要求和战略路径[J].管理世界，2019,35(7):1-7.
- [4]金碚.关于“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学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18(4):5-18.
- [5]任保平，文丰安.新时代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判断标准、决定因素与实现途径[J].改革，2018(4):5-16.

-
- [6]任保平. 新时代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 理论阐释与实践取向[J]. 学术月刊, 2018, 50(3):66-74, 86.
- [7]许耀桐, 刘祺. 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分析[J]. 理论探索, 2014(1):10-14, 19.
- [8]张海防, 张家维. 经济发达地区率先实现现代化的理论阐释与实践路径——以江苏为例[J]. 江苏社会科学, 2021(6):106-113.
- [9]王佃利. 城市治理体系及其分析维度[J]. 中国行政管理, 2008(12):73-77.
- [10]丁志刚, 陆喜元. 论县级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J]. 甘肃社会科学, 2016(4):229-234.
- [11]李润国, 姜庆志, 李国锋. 治理现代化视野下的农村社区治理创新研究[J]. 宏观经济研究, 2015(6):23-29.
- [12]许耀桐. 习近平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论析[J].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2014, 15(4):17-22.
- [13]徐湘林. “国家治理”的理论内涵[J]. 人民论坛, 2014(10):31.
- [14]俞可平.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J]. 前线, 2014(1):5-8, 13.
- [15]唐天伟, 曹清华, 郑争文. 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内涵、特征及其测度指标体系[J]. 中国行政管理, 2014(10):46-50.
- [16]习近平. 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N]. 人民日报, 2014-01-01(02).
- [17]吴磊, 李贵才, 晁恒, 等. 新时代发展中国城市政治地理学的思考[J]. 地理科学进展, 2021, 40(5):858-869.
- [18]Pierre J. Comparative urban governance:Uncovering complex causalities[J]. Urban Affairs Review, 2005, 40(4):446-462.
- [19]陈延庆, 陈出新. 论习近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思想[J]. 青岛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7, 33(3):84-96.
- [20]付晨玉, 杨艳琳. 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产业发展质量测度与评价[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20, 37(3):3-25.
- [21]侯仁勇, 张蕾, 王果. 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及实证[J]. 武汉理工大学学报: 信息与管理工程版, 2009, 31(4):637-641.
- [22]岳文泽, 吴桐, 刘学, 等. 中国大城市蔓延指数的开发[J]. 地理学报, 2020, 75(12):2730-2743.
- [23]刘鹤. 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N]. 人民日报, 2020-11-25(6).
- [24]李雨潼. 中国老年流动人口特征及社会融入分析[J]. 社会科学战线, 2021(3):270-275.
- [25]Schiller N G, Çağlar A. Towards a comparative theory of locality in migration studies:Migrant incorporation

and city scale[J].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2009, 35(2):177-202.

[26]Leyk D, Rütger T, Wunderlich M, et al. Physical performance in middle age and old age: Good news for our sedentary and aging society[J]. Deutsches Ärzteblatt International, 2010, 107(46):809.

[27]郭朝先. 2060 年碳中和引致中国经济系统根本性变革[J].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1, 21(5):64-77.

[28]赵荣钦, 黄贤金, 徐慧, 等. 城市系统碳循环与碳管理研究进展[J]. 自然资源学报, 2009, 24(10):1847-1859.

[29]方东平, 李在上, 李楠, 等. 城市韧性——基于“三度空间下系统的系统”的思考[J]. 土木工程学报, 2017, 50(7):1-7.

[30]陈阳, 岳文泽, 张亮, 等. 国土空间规划视角下生态空间管制分区的理论思考[J]. 中国土地科学, 2020, 34(8):1-9.

[31]Allam Z, Newman P. Redefining the smart city: Culture, metabolism and governance[J]. Smart Cities, 2018, 1(1):4-25.

[32]李和平, 杨宁, 张玛璐. 后消费时代城市文化资本空间生产状况解析[J]. 人文地理, 2016, 31(2):50-54.

[33]Su K, Li J, Fu H. Smart city and the applications[C]//2011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lectronics, Communications and Control (ICECC). IEEE, 2011:1028-1031.

[34]巫细波, 杨再高. 智慧城市理念与未来城市发展[J]. 城市发展研究, 2010, 17(11):56-60, 40.

[35]McAlister E. Globalization and the religious production of space[J]. Journal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 2005, 44(3):249-255.

[36]虞晓芬, 傅玳. 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综述[J]. 统计与决策, 2004(11):119-121.

[37]Guo Y, Yuan Y, Yi P. Method and application of dynamic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J]. Systems Engineering-Theory&Practice, 2007, 27(10):154-158.